



SM 社会学教材教参方法系列

社会学方法



定量研究

(第二版)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ECOND EDITION)

谢 宇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SM 社会学教材教参方法系列

社会学方法 与 定量研究

(第二版)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ECOND EDITION)

谢 宇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2版/谢宇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2

(社会学教材教参方法系列)

ISBN 978-7-5097-3665-4

I. ①社… II. ①谢… III. ①定量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8315号

社会学教材教参方法系列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二版)

著 者 / 谢 宇

出 版 人 / 谢 寿 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责任校对 / 姜夕芬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665-4

定 价 / 39.00元

印 张 / 20.75

字 数 / 356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二版序言*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影响力之大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在我看来，自 20 世纪末以来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社会变革，其在世界历史长期进程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 14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这样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历史转折点的事件。

近几十年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急剧、大规模且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是多方面的。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一个方面不受其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经济增长、教育普及和人口转型三个方面。

中国的经济产生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规模的持续增长。自 1978 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 GDP 和人均 GDP 显著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人均 GDP 在 1978 ~ 2008 年间的年增长率为 6.7%。^① 相较于如此大规模、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就连美国的黄金工业化时期（1860 ~ 1930 年）也黯然失色——当时美国的人均 GDP 年增长率仅为 1.5%，^② 远远低于中国近年来人均

* 本序依据“Evidence-Based Research on China: A Historical Imperative”一文整理而成（Xie, Yu. 2011. “Evidence-Based Research on China: A Historical Imperative,”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4: 14 - 25）。感谢张春泥、胡婧炜、施莎、赖庆在本序写作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0 年数据计算得来，同时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 ~ 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 根据 Measuring Worth (2011) 提供的数据计算，<http://www.measuringworth.com/>。

GDP 年增长率。

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在近年来也明显提高，尤其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生的人数以平稳增长为主，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开始激增。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数量的快速增长既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过这场非凡的教育扩张，中国完成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有可能迅速超过美国。

在这几十年间，中国同时也完成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急剧下降，从 6 降为 2，正好处于人口更替水平。预期寿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稳步提高，目前为 70 岁，与发达国家 1970 年左右的水平相当，并远远超过其他欠发达国家。^①

经过这场人口转型，中国开始享受“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这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年龄结构。不过，人口老龄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我认为这三个领域的变化——经济增长、教育普及和人口转型——是中国在过去 30~40 年间发生的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当然，在其他领域，很多重要的社会变迁也正在发生并且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比如，社会不平等的日益加剧，离婚率的上升，婚前同居现象的增多，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等等。

我们这一代社会科学家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能够目睹中国发生的这些社会变化，并有机会在它们发生的同时对其进行观察、记录、分析和解读。当然，中国的变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中国的社会变革恰恰是由于伴随着全球化才显得尤为令人瞩目，它不仅反映了世界整体发生的社会变革，而且显现了中国在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的独特之处。

有的读者也许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会问：“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由于篇幅所限，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要留到我日后的研究中。而在此处，我仅强调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确实存在类型上或至少程度上的差异。

首先，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力非常强大。原因有三点：第

①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1.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CD-ROM Edition.

一，政府在为全民提供福利方面占据核心地位，并且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拥有对所有关键资源的控制权，这些资源包括土地、金融机构、通信、交通、教育、能源、自然资源和医疗卫生。第二，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及覆盖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控制体系，强化了政府的控制力。第三，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在其总体环境中的迅速增长强化了包括中国官员在内的很多中国人的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的确有益于中国人民。

其次，与上述特征相关，企业和政府结成联盟，并分享共同利益。这一点在地方层级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联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能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利，并以此为治下民众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

最后，中国长期的层级式家长统治（layered paternalism）传统不仅在家庭、血缘关系和社会网络中根深蒂固，而且延伸到工作单位和政府机构中。这里的“家长统治”指的是一种等级结构，在该结构中，处在较高地位的人不仅有权对晚辈和下属发号施令，而且有义务对晚辈和下属的福祉负责。在儒家传统中，一个理想的官员亦是一个道德权威，是一位能对治下民众负责的“父母官”。“层级式”则意味着这种家长统治是层层相嵌的，因此，夹在中层的官员极易陷入对上级忠诚和对下级负责的矛盾中。这种结构通过一种精心设计、以业绩为基础的晋升体制来维系，并从汉代延续至今。由此看来，单位对今天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影响，不仅是共产主义时代的遗物，而且可以看作是古代层级式家长统治传统的延续。^①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中国经济必然走向美国式的完全资本主义模式。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参与者作为“理性人”追求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协调。因此，供求定律在控制这些独立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上变得尤为重要。而在中国，这种关系却受到政府行政的强烈干预，政府不仅垄断关键资源，而且通过社会结构强化层级式家长统治的传统。因此，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不平等并非来自与生产力相关的个人禀赋的差异，如受教育程度和职业，而是产生于各种将人划分为不同类别的社会界限，如地区、城乡、单位和社会网络。

即使如上文所言，中国社会的变革具有独特性，而且需要我们研究这种独特性，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特例除了满足社会科学家的学术好奇心之外

^① 谢宇、董慕达：《天地之间：东汉官员的双重责任》，《社会》2011年第4期，第1~28页。

就没有其他更普遍的借鉴意义了呢？我认为当然不是。中国所经历的这场独特的社会变迁，不仅其独特性本身具有研究价值，而且它还具有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潜力。在过去将近三个世纪里，由于西方社会主导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其演变路径几乎成了“现代化”、“发展”和“进步”的同义词。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的演变建立在两大支柱的基础之上：一是作为唯一合法政治体制的民主制度；二是作为唯一可行经济体制的自由市场。而如今，中国自近三个世纪以来头一次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对西方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既没有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也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平稳增长却持续了30多年。相比之下，美国等西方经济体在近年来却面临滞涨与衰退。这是否说明中国模式可能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甚至更好的发展路径呢？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与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不仅有趣，而且迫切地需要我们加以关注。为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的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搁置对中国的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或来自对别国经验的照搬，或出于理论上的推断。一个朴素的事实是：社会科学家即使做出了研究上的努力，也依然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知之甚少。要了解中国，我们必须将中国置于它自身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情境中；要了解中国，我们还必须以谦虚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并将我们的研究构筑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而非纯粹的想象上。

尽管有些社会科学家追求的是普遍有效的理论、不受具体情境影响的社会研究，然而，很多研究者也开始认识到这些宏大理论的价值局限性，并开始相信最好的社会研究一定是在具体情境下的研究。如果社会理论应该在社会情境中构建，社会研究应该在社会情境中进行，那么，我上文所例证的那些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大规模、快速的社会变革将尤其值得研究：它们的独特性存在于今天的中国——既不是别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的翻版，也不会在未来的中国重现。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仅发生在当代中国背景下的社会现象，这种背景包括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这些是别处都不具备的。因此，我们需要设计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框架，专门用于研究中国当代的社会现象，而盲目地将美国式的西方社会科学照搬到中国，不仅是天真的，而且注定会失败。

我已经看到，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如这个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正在经历快速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意见为主、意识形态化的、思辨式的讨论已渐渐失去了市场，实证研究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接受。这是必然的趋势。无论

是公众、政府还是学术界都欢迎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因为这样的社会研究符合他们的利益。首先，与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家一样，普通的中国人也不完全理解他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的一切，因此，他们自然有兴趣也切实需要去理解那些最直接地影响他们生活的变化。其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决策之前也需要掌握更准确的信息或依据，以便理性决策。最后，中国是重要的世界大国，它在所有重要的领域——从艺术、体育和金融，到自然科学、技术和世界和平——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在社会学领域也能做出卓越的贡献，这些贡献能在世界范围的学术圈中得到认可和赞誉。

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今的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些变革，那么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就仍不全面。尽管当代社会科学家能否完全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变化这一点值得商榷，但至少我们不应该错过这样一个收集经验资料的黄金时期，以便未来的社会科学家有可能超越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现有理解。我们有独一无二的机会来记录和保存中国社会的这段历史。因此，中国的实证研究是历史对当今社会科学家提出的迫切要求。为了应对这一迫切要求，我们更需要有专业的、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正因如此，我在《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我将这种独特性总结为三个原理，即变异性原理、社会分组原理和社会情境原理。我认为，这三个原理可作为我们运用实证方法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指南。本书的第一版自出版以来，在读者中收获了良好的反响，有的读者针对这三个原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读者建议能否增加更多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案例。为此，我们推出新版以回应读者的要求。

在第二版中，我们除了修订第一版的印刷错误之外，还新增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奥迪斯·邓肯的学术成就——社会科学中用于定量推理的人口学方法》的英文原文于2007年发表在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上。在这篇文章中，我着重介绍了邓肯对总体逻辑思维的贡献。总体逻辑思维区别于类型逻辑思维，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这一思维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以经验为基础、以量化为导向去概括总体变异的系统模式，而不是去追求“普适法则”。这一思维还意味着由于总体变异的真实存在，利用观测数据获得的精算概率无法代替真正的个人概率，因此我们尽管能得到准确的描述，但仍然难以在个体层面上做出准确的因果预测。变异性问题是令邓肯困惑的难题，也是当前社会科学界研究因果关系的兴趣所在。我的三个原理正是基于邓肯对总体逻辑

辑思维及定量方法的灼见提出的，我在本书中收录此文，不仅仅是纪念邓肯对定量社会科学方法的贡献，更是希望引起读者对总体变异性问题的关注。

第二篇新增的文章《下乡给知青带来了好处吗？——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人口流动的社会后果的再评价》是用定量方法对中国人曾经历过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该文章的英文原文于2008年发表在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对 Zhou 和 Hou^① 提出的短期下乡对日后的教育可能带来正面影响这一观点的因果性提出了疑问：是由于考上大学而提早结束了下乡，还是短期下乡对年轻人的磨练有助于他们日后取得更高的教育成就？在分析上，我们强调了选择性或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给因果推理所造成的干扰，即下过乡者和未下过乡者、短期下乡者和长期下乡者在社会经济后果上的差别也许是由这些群体间的原有差别造成的，而非下乡经历本身造成的。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使用了兄弟姐妹对数据（sibling data），比较了同时期兄弟姐妹中下过乡者和未下过乡者在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地位等多方面的差异。因而从方法上，我们控制了下过乡者和未下过乡者在家庭背景上诸多难以观测到的异质性，从而获得更可靠的估计。

我在前文中提到，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来观察、记录、分析与解读。本书新增的第三篇文章《认识中国的不平等》总结了我对中国社会变迁中不平等现象的一些观察与思考。该文章根据2009年我在华中科技大学讲座的录音整理而成，并于次年发表在《社会》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我对中国的社会不平等提出三点看法：中国社会的平等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集体因素（如单位、城乡、区域等）；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中国人对不平等有较高的容忍度，认为不平等是国家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在文中，我用过往研究和宏观数据对这三点看法加以佐证，但这三点看法是否成立仍有待未来的中国实证研究去检验。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可能将近年来我对中国的所有研究尽收录于此书，但希望以上这三篇新增的文章能够抛砖引玉，引导更多的读者关注并研究中国的社会变化。如果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实例能够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启发与帮助，我将从中感到无比的欣慰，本书的再版也将具有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① Zhou, Xueguang and Liren Hou. 1999.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12-36.

最后，我要感谢我在世界各地的学生、同事、合作者和助理。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鼓励与帮助不仅仅使我有完成我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一直让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的想法写出来贡献给读者。当然，我能预料到，有些读者会比另一些读者更喜欢我的著作，这也恰恰符合了我的社会科学研究第一原理——变异性原理。

谢 宇

2012年7月7日于北京

一版前言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为了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从自身经验和学习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知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积累的知识体系也越来越复杂。

学术研究的任务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观察、分析和总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变化规律，从中提炼和创造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将被补充进人类的知识体系，使之不断丰富和更新。要能够真正认识前人没有经历、尚未发现的新的知识，社会责任、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是学者们进行知识开拓的三个重要的前提。

学术研究是枯燥和辛苦的工作，特别是从事基础知识研究的工作，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益需要一个过程，研究者通常不能从社会及时得到回报，没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很难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去默默无闻地辛苦耕耘。

有了社会责任感，并不一定就能够探求到社会演变的规律。有时客观事实背后的道理是与我们感情上的期待和价值追求相违背的，是很残酷的，这时就需要具有真正的客观精神和科学态度，承认客观事实，尊重研究结果所揭示出来的客观规律，努力在认识和思考当中做到“价值中立”，只有这样才能冲破传统思想框架和个人利害关系的无形束缚，做出真正带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

有了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也有了立足于实证研究去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精神，在从事每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还需要有适当的研究方法，才能事半功

倍，把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和提炼出来。就好像一个木匠需要一套锐利高效的工具，一个生物学家需要一架高倍的精密显微镜，一个渔夫需要一张精巧坚韧的渔网，一个从事社会调查研究的社会学家同样需要符合自己专业特点的研究方法。当年，创立社会学的学者们所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与自然科学相似的社会科学体系。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应当是在社会研究领域发现知识、论证知识的基础方法，所以社会学与社会哲学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在中国大陆重建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在讨论如何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传统始终强调“学以致用”，换言之，强调应用性研究而轻视基础性研究。过去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所考察的题目与内容，或者是对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的诠释，或者是应用性“国策”的论述。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批评一些学者到了田里不识五谷，指的主要是那些在实验室长期从事基础研究或只在图书馆读书而不接触实际社会的学者。也正因为中国文化中的这一传统，基础学科直到近代始终没有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这些基础学科不仅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学科，材料、建筑、机械等工科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甚至包括历史、语言、逻辑等人文学科。建国以来在这些领域中取得成绩的中国学者，也大多受过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仅有从外国学习和复制技术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自己的基础科学，并在一系列基础领域发展出独立创新的实力。所以现在最需要的是大批学者长期默默无闻地在各个基础学科的研究领域里耕耘，不断积累本国学术创新的基础与能力，并逐步建构起一个国家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彼此衔接、相对平衡的学术研究体系。

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技术更新步伐加快，经济生产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很容易再次把主要注意力放到现时急需应对的那些应用性研究课题上去。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更应同时加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层研究的重视与投入。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别与距离，不在于表面层次的相似或不同，而在于一些最基础的、根植于几千年不同文化传统在社会理念之间的差别，对于这些深层面专题的研究和讨论将有助于国人理解世界并更好地与他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进行对话。

一

在社会学的教学中，理论与研究方法一直是各高校社会学系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定量分析方面，我们与西方国家社会学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不仅在各自的研究中存在不同的方法论倾向，而且人们在如何看待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2005年6月谢宇教授来北京大学与社会学系的学生座谈时，一个集中的话题就是应当如何认识和对待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这两类主要的研究方法。

其实，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同时需要定性和定量研究，两者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分割开，也不应当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

一些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认为定性研究缺乏科学性。其实，根据某种特征和规则把社会现象进行类型的划分，是定量研究的前提，而这本身就是定性分析。矿物、植物和动物分类学可作为自然科学的代表。当我们计算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时，首先就需要对两者进行分类，分别定义，这就是定性分析。如果前人在定性分析方面已有所积累，那么有些从事定量研究的人就可以直接运用已有的分类方法、基本概念而不需要自己来讨论分类及定义，这并不是说，定性研究对于他来说是不重要的。定量分析通常是以定性分析的结果为基础，再对社会现象的变化过程、社会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数据分析，从而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比如社会学家对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学术界对于“教育”和“收入”这两个变量各自的定义和测量指标首先需要具有共识，这是开展这一研究的前提条件。

同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如果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严格地把两者区别开，只提倡或基本偏重其中一种方法，有时可能会出现偏差。

定量分析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是有局限性的。社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些“变量”的内涵及其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也必然处在变化过程之中，对于这些变化的分析，可能就需要定性研究者的观察与概括。大家都承认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导致质变，那么质变发生的这个临界点在哪里？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会发生质变，从而导致一般的定量分析无法真正客观地认识已经在性质上发生变化的客观事物？这是社会学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相对来说，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比较稳定，社会的发展主要是量

变而很少质变，所以西方国家从事定量分析的社会学家们可能会忽视定量研究的局限，这是我们在对比中国和西方社会学研究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有些学者长期从事定量研究和数据分析，他们可能与被分析的对象完全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或感受，他所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数据库中的变量和数字，他的分析从数学的角度讲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当有些“变量”（如教育、收入甚至年龄）的性质发生某种重要变化时，我们还应当考虑这些变量的“承载者”（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对此的实际感受。无论对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都要看到各自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在一些经济和社会组织程度比较发达的国家，社会调查已经成为许多部门和机构定期开展的常规性活动，这些调查所使用的“变量”及其测度的方法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惯例。当然在最初开展这些调查时，关于“变量”及测度方法的选定是经过大量的论证并达成一致的。这些国家的研究者不需要自己去实地调查、自己去收集数据，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利用现有的数据，思考采用什么统计分析方法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各种分析工具、统计方法、数学模型都是在这些定量分析研究者的辛勤工作中发展出来的。作为统计学、概率论、分析数学，这些成果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把这些复杂的数学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调查的数据中时，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统计体系处于迅速变化的国家里，它的“科学程度”可能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与此同时，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也经常指出定性研究（如个案观察访谈）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一是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问题，即使你调查访谈得到的信息都是准确无误的，它究竟能够代表这个社会中多大比例的一部分人？是属于多数人的代表还是只是若干罕见的个案？定性调查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对于研究对象的代表性缺乏论证，人们对其结果和结论的实际意义就会提出质疑。

二是定性研究如果缺乏一些量化的指标就很难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甚至很难对研究对象进行最基本的勾画。这样缺乏量化指标的定性研究的成果表现出许多不确定性，必然降低其学术价值和应用意义。

其实，当一个人类学家进入一个村子进行调查时，他必然会使用一些哪怕是最基础性的量化指标，譬如村民们的年龄、上学年数、收入水平、外出天数、家庭规模等，如果完全没有这些带有数字的指标，他的民族志和访谈记录就只剩下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性语言了。那些重视定性研究的学者，在他们的实际调查中还是必然会使用一些基本的量化指标，也完全没有必要把定量研究看作是“另

类”的研究方法予以排斥。

定量分析的长处是人们容易认识到的，在许多方面可以补充定性研究的不足：一是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可以使我们判定样本在社会群体中的代表性；二是量化数据及分析为我们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三是有助于克服研究者既有的“价值倾向”，用客观数字来检验人们通常得到的“印象”是否真正符合客观事实；四是增加了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如人口生育和死亡的定量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对人口的未来增长进行预测。

谢宇教授曾经谈到定量研究还有另外两个长处：一是学生容易学习，可以通过统计课的规范学习从老师那里学到比较系统的定量研究方法，而定性研究则要靠研究者观察时得到的“直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比较难的；二是定量分析的质量优劣容易评价，在同行中容易形成共识。我也很同意他的观点。统计分析方法的规则是统一的，彼此容易学习，而且统计研究方法发展很快，人们必须经常互相学习以掌握最新进展，学者之间的交流很多，对研究做得出色和方法有创新的学者，大家都很服气。不像各自做自己个案研究、偏重定性研究的学者，由于相互的研究无法比较，相互之间交流较少也比较容易互不服气。

二

谢宇教授认为在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界，定量分析是亟待加强的方面，在这方面的基本训练太弱。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这也是北大社会学系近几年来加强与海外学者的合作，特别关注开设定量分析的基础课程，特别关注社会基础调查和数据收集项目，鼓励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多运用定量分析的主要原因。

我想，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在定量分析方面比较弱，可能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要了解第一个原因必须追溯学科的历史。中国把社会学从国外引入的时候，比较强调西方社会产生出来的社会学理论和观点对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适用性需要借助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来验证，比较重视人类学在定性研究方面的调查方法和视角。实际上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学机构里，社会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是密切结合的，在研究方法上没有特别地去重视发展定量分析。

第二个原因：西方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大发展的时期大致是20世纪50年

代之后，这时中国的社会学已经被取消，这种状况显著地扩大了中国与西方社会学在定量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应用方面的差距。

第三个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社会学逐步恢复以来，由于原有队伍人数少、长期脱离专业并严重老化，所以那时进入社会学队伍的中青年人员大多来自哲学、外语、马列主义等专业，定量研究的基础和兴趣都十分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队伍中关于定量研究的发展。

第四个原因：中国高考分为文、理两大类，文科学生从高中起就开始忽视数学，各大学社会学本科招生主要面向文科考生，这些学生入学后，即使选修了社会统计学课程，但由于数学基础较弱，也影响了学生对学习定量分析方法的兴趣，以及他们在学位论文写作中对定量方法的使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也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况，自2000年开始在高考中实行文理兼收。

第五个原因：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社会学与人口学基本上是不分家的，虽然许多大学里同时有社会学系和跨学科的人口研究所或人口研究中心，但是研究人口的学者们通常出身于社会学，人口研究所的学者同时也经常是社会学系的教师并担任教学工作。人口学家们一般都是以定量分析为主的，他们作为社会学系的成员促进了社会学队伍的定量研究。由于中国的人口学比社会学恢复得略早一些，在各大大学先一步成立了独立的人口研究所，国内定量研究能力比较强的中青年学者，大多集中在人口研究所。这一历史造成的机构分立，在客观上也不利于社会学在定量研究方面的加强与发展。

在北大与学生座谈时，谢宇教授指出要做出一个好的定量研究，难度也是很大的。用他的话来说，定量研究有三只脚，缺一不可。第一个是把研究对象“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把要研究的问题想清楚。这实际上是努力在理论上有所发展。第二个是研究设计，即数据如何说明要研究的问题。研究设计建立在概念化的基础上，只有想清楚了要研究的问题才能够提出一个统计的模型跟这个概念化的东西相联结。第三个才是从数据分析到研究结果。这三个是平行的也是同时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实际上不是统计，而是要有好的概念化。有的人只知道模型和计算机，认为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模型学好了就行，这是对定量研究的误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是一个同时发展的关系，特别是难在三者的统一上。评价一篇定量分析的文章是好文章，就是指它的这三个方面之间很紧凑（tight），问题的说明和概念化、研究设计，以及分析结果三者之间联系得很密切。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数据分析的结果提供了一个明确而不是模

棱两可的答案。有些人认为定量研究只是把现成数据用计算机软件计算一下，套用几个常用的数学模型就可以得出若干结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三

无论是具体统计方法的系统学习，还是谢宇教授所讲的定量分析三个部分组合的运用，都是国内社会学领域特别需要加强的，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成为国内一些学者们的共识。近几年来，包括谢宇教授在内的一些在国外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帮助国内大学在这方面加强培训。

谢宇教授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在 80 年代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美国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取得了社会学和科学史两个硕士学位和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另一所著名学府密执安大学任教，1996 年即获得了正教授职位并得到 John Stephenson Perrin Professorship 的头衔，之后又陆续获得 Frederick G. L. Huetwell Professorship (1999 ~ 2004 年) 及 Otis Dudley Duncan Professorship (2004 年至今) 的头衔。由于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在 2004 年一年之内，他同时获得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Fellow,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Taiwan) 两项重要的荣誉称号。他已成为研究方法和定量社会学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谢宇教授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几部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他与 Daniel A. Powers 教授在 2000 年出版的《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Academic Press) 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作。谢宇教授和 K. A. Shauman 教授合作于 2003 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界的女性》(*Women in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该书使用大量的资料数据分析说明了学术界为什么女性科学家比例偏少的原因，反驳了女性在学术界受到歧视的传统观点，出版后美国《科学》杂志 (*Science*)、《自然》杂志 (*Nature*) 和《选择》杂志 (*Choice*) 先后在 2003 年和 2004 年刊载了书评。

他和 Kimberly Goyette 教授合作于 2004 出版的《美国亚裔的人口统计描述》(*A Demographic Portrait of Asian American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and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及与 Arland Thornton 和 William Axinn 两位教授合作于 2007 年出版的《婚姻与同居》(*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